



中国出版通史简编

ZHONGGUO CHUBAN TONGSHI JIANBI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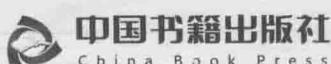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 组编
本书编写组 编写





中国出版通史简编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 组编
本书编写组 编写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出版通史简编 /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组编.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 9

ISBN 978 - 7 - 5068 - 3749 - 1

I. ①中… II. ①中… III. ①出版工作—文化史—中国 IV. ①G239. 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18105 号

中国出版通史简编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 组编

本书编写组 编写

责任编辑 钱 浩 陈德勇

特约编辑 闫利军

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

封面设计 嘉玮文化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 52257143 (总编室) (010) 52257153 (发行部)

电子邮箱 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盛天行健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800 千字

印 张 39.5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68 - 3749 - 1

定 价 168.00 元

《中国出版通史》

编辑委员会

总 顾 问 石宗源 柳斌杰

顾 问 王 益 王仿子 宋木文 宋原放 刘 果 吉少甫
高 斯 戴 逸

主 任 石 峰

副 主 任 余 敏 郝振省（常务） 肖东发 李致忠 王建辉
成 员 方厚枢 王余光 王建辉 史金波 叶再生 刘光裕
朱赛虹 余 敏 吴道弘 李致忠 李瑞良 宋应离
杨德炎 汪家熔 肖东发 邵益文 周少川 郑士德
郝振省 徐学林 曹 之 傅璇琮 缪咏禾 蔡学俭
潘吉星 戴文葆 魏玉山 黄润华

办公室主任 魏玉山

副 主 任 丘 淩 刘拥军 徐焕生
成 员 刘兰肖 周建新 李文娟

《中国出版通史》

分卷作者名单

先秦两汉卷	肖东发 等
魏晋南北朝卷	周少川 等
隋唐五代卷	曹之
宋辽西夏金元卷	李致忠
明代卷	缪咏禾
清代卷（上）	朱赛虹 曹凤祥 刘兰肖
清代卷（下）	汪家熔
民国卷	王余光 吴永贵
中华人民共和国卷	方厚枢 魏玉山

《中国出版通史简编》

编辑委员会

主任 郝振省

成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平 刘兰肖 刘拥军

李致忠 肖东发 郝振省

游翔 魏玉山

《中国出版通史简编》

出版工作委员会

主任 王平

成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平 牛翠宇 孙马飞

李国永 孟怡平 武雅彬

钱浩 游翔

《中国出版通史简编》

编写组成员

王 平 乔继堂 侯书生
游 翔 贺原平 钱 浩

出版前言

“中国出版通史”是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原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主持的一项研究课题，也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集中了全国出版史、文化史领域的一流专家、学者，历时8年完成。该项目对绵延五千年的中国出版历史进行了深入、细致、系统的研究，获得了诸多理论上的突破，取得了显著的学术进展，其最终研究成果，汇集成《中国出版通史》一书，于2008年12月由中国书籍出版社正式出版，成为我国出版文化界、历史学界和学术界的一件盛事。

《中国出版通史》一共有九卷，近400万字，内附历史图片800余幅，是迄今为止我国篇幅最长、规模最大的中国出版史著作。这本书的内容非常丰富，它系统描述了我国出版事业形成、发展的历史条件和具体过程，记述了我国历史上有重大贡献的编辑家、出版家在文化创造、文化积累、文化传播方面的业绩，梳理了各种类型重要典籍的编纂出版过程和社会文化意义，探索并总结了出版事业发生、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典型形态，揭示了编辑出版活动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形成与传承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展示了灿烂辉煌的中国出版文化及其对世界文化、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

《中国出版通史》九卷本出版以后，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好评，在文化学术界、出版界产生了较大的反响，得到了专家学者的肯定和认可，在广大普通读者中也产生了一定影响。2009年2月26日，新闻出版总署专门召开了《中国出版通史》出版座谈会，与会领导和专家学者纷纷发言，对该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著名语言学家许嘉璐先生对《中国出版通史》赞赏有加，他认为这部书“是开创性的，给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填补了空白”，“影响已经超出了出版界，超出了学术界”。时任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指出，“《中国出版通史》的出版，是当代出版史学工作者对国家的重大贡献”。一些热心读者和专家学者还给作者和出版社来信来电，对该书的学术价值和文化社会意义给予充分肯定。当然也有专家学者在深入研读该书后，对书中的一些观点和内容提出了商榷意见。我们对九卷本《中国出版通史》所获得的良好评价和广泛影响深感欣慰。

《中国出版通史》具有传承出版文化、弘扬民族精神的特殊功能。对于这样一项重要的科研成果，理应让更多的人，特别是青年读者了解、分享，以发挥更大的教育、引导作用。不过，《中国出版通史》九卷本篇幅过大，专业性也比较强，普通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接受起来有一定困难，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核心内容的传播，使其潜在的文化功能难以得到充分的发挥。

正是考虑到这个情况，我们征得各位原作者的同意，决定以九卷本《中国出版通史》为基础，编纂《中国出版通史简编》，并制作相关的多媒体光盘。与九卷本《中国出版通史》相比，《中国出版通史简编》篇幅大为缩减，并尽量采用通俗语言表述，以期将《中国出版通史》的主要内容、基本思想、主体结构集中呈现出来，而相关的多媒体光盘则运用音频和视频等多种手段，形象展示中国出版历史的丰富内涵，文本更为精炼，形式生动活泼。这样处理，目的就是便于让普通读者，特别是广大青少年了解祖国辉煌的出版文化传统，汲取渗透在中国出版历史中的精神营养，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从而能以一种更加从容的态度，面对全球化时代的价值危机和文化挑战，确立并坚守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和文化观，也可以让更多的人分享《中国出版通史》的学术资源，领略中国出版史研究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出版通史简编》的编撰和多媒体光盘的制作，并不仅仅是对九卷本《中国出版通史》的简单缩减，而是一次新的创作，除在结构和文字方面做了许多调整、提炼和修改，还对近年来出版史研究的新成果进行了总结和吸纳，从而丰富了《中国出版通史》的解释体系，深化了《中国出版通史》的学术内涵。

总之，我们是本着科学、严谨、适度、创新的原则来编纂《中国出版通史简编》和制作多媒体光盘的，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在九卷本《中国出版通史》的坚实基础上，打造出一部文字简明、内容翔实、结构合理的《中国出版通史》普及版本，让更多的读者了解中国出版的辉煌历史，认识中国出版文化的深刻内涵，感受中国出版文化的独特魅力。

中国出版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中国书刊出版业协会《中国出版通史简编》编辑委员会
主任委员：李建臣 副主任委员：王海明 2013年9月

目 录

第一章 中华文明的形成与中国出版的萌芽	(1)
第一节 汉字的产生	(1)
第二节 原始图书典籍和原始编辑活动	(4)
第三节 春秋战国时期的编辑出版活动	(9)
第四节 先秦著名图书编撰家	(18)
第二章 秦汉:中国出版的发端	(22)
第一节 秦朝短暂的出版活动	(22)
第二节 两汉出版的历史背景与整体特征	(26)
第三节 两汉时期的图书编校与出版活动	(40)
第四节 两汉时期的图书流通与贸易活动	(50)
第五节 两汉时期编辑出版的图书	(59)
第六节 造纸术的发明与改进	(73)
第七节 两汉著名图书编撰家	(79)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的出版	(88)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出版事业的发展概况	(88)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的图书收集整理和出版	(94)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的图书编撰和出版	(104)
第四节 魏晋南北朝出版事业的重要人物和事迹	(116)
第五节 魏晋南北朝出版物的材料和形制	(122)
第六节 魏晋南北朝图书出版的相关技术	(124)
第七节 魏晋南北朝的图书流通和管理	(132)
第四章 隋唐五代的出版	(139)
第一节 隋代出版简述	(139)

第二节 唐代出版的历史背景	(148)
第三节 唐代的图书编撰	(153)
第四节 唐代雕版印刷术的发明	(170)
第五节 唐代图书出版	(179)
第六节 唐代佛经翻译、编撰与出版	(185)
第七节 唐代图书流通	(190)
第八节 五代十国出版	(195)
第五章 宋、辽、西夏、金出版事业的勃兴	(201)
第一节 宋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政策	(201)
第二节 宋代的官方编修与繁荣的私人撰述	(203)
第三节 宋代的出版机构与出版概况	(210)
第四节 宋代的重要出版家及其出版事迹	(218)
第五节 宋代出版图书的主要内容及出版思想	(224)
第六节 宋代出版图书的装帧艺术	(229)
第七节 宋代出版物的发行流通	(232)
第八节 宋代朝廷对图书出版流通的管理	(234)
第九节 雕版印刷术的高度成熟与活字印刷术的发明	(236)
第十节 辽、西夏、金出版事业概况	(240)
第六章 元代出版事业的继兴	(255)
第一节 元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政策	(255)
第二节 元代的官方编修机构与编修活动	(257)
第三节 元代的私人撰述	(259)
第四节 元代的官方出版机构与出版概况	(261)
第五节 元代的民间出版	(263)
第六节 元代出版图书的装帧艺术	(265)
第七节 元代出版物的发行流通	(268)
第八节 元代朝廷对图书出版流通的管理	(270)
第九节 元代对出版印刷技术的推进	(271)
第七章 明代出版的繁荣	(273)
第一节 明代出版事业概况	(273)
第二节 官府编撰的图书	(279)
第三节 私家的编撰	(290)

第四节 书坊的编纂	(307)
第五节 明代的出版机构	(313)
第六节 明代著名出版家	(323)
第七节 明代与东西方国家的出版交流	(328)
第八节 明代出版物的装帧与印制	(334)
第九节 明代图书的经营、流通和收藏	(337)
第十节 明代出版和明代社会	(344)
第八章 清代前期出版	(348)
第一节 清前期出版业发展的社会背景	(348)
第二节 清前期中央官署的图书编纂	(354)
第三节 清前期官署出版机构及其出版概况	(358)
第四节 清前期民间图书编纂与著述	(363)
第五节 清前期民间出版活动	(368)
第六节 清代前期印刷技术的发展	(373)
第七节 清前期图书装帧艺术	(377)
第八节 清前期对图书出版流通的管理	(381)
第九节 清前期少数民族文字书籍的出版	(385)
第九章 清代后期出版	(400)
第一节 经世之学的视角转换	(400)
第二节 同光间地方官刻	(404)
第三节 近代印刷技术和纸	(409)
第四节 在华教会和外国人的出版活动	(414)
第五节 新出版的开始	(417)
第六节 晚清出版物	(423)
第七节 传统出版物的式微	(435)
第八节 新式出版物的发行	(438)
第十章 民国出版	(440)
第一节 民国出版业的形成	(440)
第二节 民国出版业的发展	(449)
第三节 民国出版业的兴盛	(459)
第四节 民国出版业的艰难历程	(471)
第五节 出版法律与出版管理	(475)

第六节 出版经营活动	(485)
第七节 著名出版家	(499)
第八节 出版与社会文化	(505)
第九节 教科书、丛书、工具书与儿童读物的出版	(513)
第十节 学术著作的出版	(522)
第十一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出版事业	(525)
第十一章 新中国的出版事业	(534)
第一节 新中国出版事业的建立和发展	(534)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出版事业	(552)
第三节 拨乱反正时期的出版事业	(570)
第四节 改革发展时期的出版业	(578)
第五节 出版法规建设	(596)
第六节 出版教育与出版科研工作	(601)
第七节 出版社团的建立与发展	(607)
第八节 港澳台地区的出版业	(610)
参考文献要目	(617)

第一章 中华文明的形成与 中国出版的萌芽

出版是人类文明活动的重要内容。一方面，不同的古代文明孕育了不同的出版历史活动；另一方面，不同的出版历史活动又促进了各自文明的发展，不断地推动着文明的进步与流传。中国古代出版活动就是在中华文明形成以后开始萌芽和发展起来的。离开了中华古代文明沃土的滋润和早期中国传播活动的发展，中国古代出版活动不可能发芽、成长和结果。追溯中国出版活动的起源，必须从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传播活动的发展说起。

第一节 汉字的产生

在中华早期文明成果中，与出版关系最为密切的是汉字的诞生。文字的产生是人类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文字的产生也是出版活动产生的重要条件之一。在文字产生之前，人类主要通过口口相传的言语表达情感，传递特有的信息。由于口语的局限性，人类早期的诸多事件无法传播于后世，只能通过集体无意识传递人类某些朦胧的、零碎的共有记忆和经验。文字以其超越时空限制的特性成为人类文明的基石。书写符号的出现直接为编辑活动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并由此改变了人类历史。所以，研究中国出版史，首先要从汉字的产生讲起。

汉字的产生是一个十分漫长的历史过程，在文字产生前，大体经历了“有声无言”、“有言无文”两个时期。在语言和实物的基础上，又经结绳记事、契刻和图画三个阶段，方才产生汉字。

(1) 结绳记事

就是用绳子打成结来帮助记忆。这是世界上许多民族都利用过的一种方法。我国的古书上有许多“上古结绳而治”的记载。例如《周易·系辞下传》云：“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明确指出在文字产生以前，人们通过结绳帮助记忆。《庄子·胠箧》中说：“昔者……民结绳用之。”唐孔颖达《周易注疏》：“结绳者，郑康成注云：事大大其绳，事小小其绳。义或然也。”唐李鼎祚《周易集解》中也说：“古者无文字，其有约誓之事，事大大其绳，事小小其绳，绳之多少，

随物众寡，各执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可见，我们的祖先确实使用过结绳记事的方法。直至现代，结绳的方法在我国边远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中还有使用。

(2) 契刻

就是在竹、木、陶等材料上刻各种记号用以记事，帮助记忆。这也是古代广泛使用过的方法。古时双方订约时，把两块木片合拢起来，在上面刻画记号，双方各执一块，以帮助记忆，并有符信之意。东晋梅赜所献的《古文尚书·序》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这是说在结绳记事之后，由八卦、书契代替结绳之政，然后文籍产生了。《魏书》、《隋书》等古代史书中还记录了当时我国一些少数民族使用书契的情况，说这些少数民族“无文字，刻木记契”。直至近代，某些少数民族仍有采用这种方法的。云南省博物馆曾收藏有佤族的一根传代木刻，木头两侧刻有许多缺口，每一缺口代表着一件事情，以刻口深浅表示事情的大小。

契刻同结绳一样，基本是备忘用的，留下的只是代表一件事情的符号，而不是语言符号。它只能唤起对某种事情的回忆或想象，而不能表达抽象的思想和概念，只能记事而不能达意，所以它虽然有着帮助记忆的作用，但还不是知识的具体记录，某一部分用之既久，约定俗成，让更多的人能理解后，便可演变为指事文字。

(3) 图画

由于劳动和生活的需要，上古人常把所观察到的与自己生活有密切关系的事物画在所居住的洞穴的石壁上。起初，这些记事的图画是非常生动、逼真的。如想要人知道所说的是鹿，就精心地画一头鹿。有时，还画几件东西来表示一件事情。时间长了，当人们习惯了这种图画之后，就不画得那么复杂、细致了，只要用几根线条勾勒个大概轮廓，把原来画的复杂的图画，简化成一定的图案符号，人们见到这个符号也就知道它所代表的是什么了。这样，图画就逐渐脱离了对具体事物的描绘，变成事物的一般意义的代表，可以拿它所代表的事物的名称来称呼它。这样一来，图画就和语言相结合而成为交流思想的工具了，由此形成了原始的图画文字或图形文字。

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对文字形成最有影响的，可能是图画符号（也有人称为图画文字）。我国许多民族的文字中仍保存着图画记事的痕迹。而图画符号的进一步发展，就可能转变为象形文字。由图画符号演变为象形文字，有一个循序渐进、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正如唐兰先生在《中国文字学》中所说：“文字本于图画，最初的文字是可以读出来的图画，但图画却不一定能读。后来，文字跟图画渐渐分歧，差别逐渐显著，文字不再是图画的，而是书写的。”而“书写的技术，不需要逼真的描绘，只要把特点写出来，大致不错，使人能认识就够了”^①。这就是原始的文字。

^① 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55页。

(4) 仓颉造字的传说

我国古代的结绳、契刻和图画符号等记事方法为汉字的产生奠定了一定的基础。那么汉字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关于这一问题，中国历史上有一个流传甚久的仓颉造字的传说。成书于战国时期的《世本·作篇》说：“黄帝使仓颉作书。”《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李斯的《仓颉篇》、《淮南子》、《论衡》等书中都有仓颉造字的记载。说得最为具体的当数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序》：

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远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义，万品以察。……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寖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

这段文字是汉代人对传说中的仓颉所处的时代及其所任职务、受何启示而创造文字的描述，还描述了他发明文字的方法和步骤，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文”、“字”、“书”这几个基本概念的认识及所下的定义，同时也说明了文字产生后的意义和作用。

但这毕竟是历史传说，文字是人类社会某一发展阶段上的必然产物，它是人类在生产实践中发明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由许多人逐渐创造积累起来的，而非一人独创。中国的早期文字，无论是甲骨文还是金文，都有许多异体字。也就是说，同一个字有几种甚至十几种不同的写法，如果是仓颉一个人发明，他为什么要给自己和别人制造这么多麻烦？

而在汉字产生之前，书写汉字的工具就已产生。清朝人罗颀在《物原》一书中说：“虞舜造笔，以漆书于简。”这种说法基本上是可信的。西安半坡陶文中的好几种图案，如人面纹、游鱼图案、米字形纹饰，是用笔或类似的工具描绘上去的，其笔触清晰可见。1959年山东大汶口发现的陶文，有契刻和书写两种，说明当时已经使用笔和契刻类的书写工具了。只是当时的书写工具可能是极其简陋的。书写工具的出现和丰富，为汉字的产生提供了一定的物质条件，并在以后的文献著录和复制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汉字的出现和汉字书写工具的具备，为此后的著述、编辑、出版活动提供了基本的物质条件。



仓颉画像

第二节 原始图书典籍和原始编辑活动

一、原始图书典籍的出现

所谓原始的图书典籍是指正式图书产生以前的文字记录，或者说是档案文书材料。它们虽然不是正式的图书，但又确是当时人某种活动的忠实记录，不是杂乱无章的文字显现，已经具备了图书的某些要素，也可以说是早期出版物的萌芽状态。

公元前 2070 年到公元前 1600 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王朝时期。根据古代典籍中所保存的有关夏王朝的资料，结合出土的甲骨文献，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推论，在夏这一历史时期，已经基本完成了由文字到文献这一历史性的转变，夏代末年是我国原始图书典籍产生的萌芽阶段，已经初步具备了出版活动的部分要素。

从公元前 1600 年商王朝建立到公元前 771 年西周灭亡，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商周文明时期。商周时期，人们开始在甲骨、青铜、玉石乃至竹木上书写文字，记载知识，从而形成了甲骨文书、青铜器铭文、玉石刻辞、竹木简牍等文献形式。

所谓甲骨，系指龟甲和兽骨。契刻在这些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就称为甲骨文或甲骨文书。甲骨是商周时期的一种重要文字载体。

商周时期的甲骨文书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文书档案，不同于后世的图书。但是从其记载的内容和装订的形式来看，它们已经具备了正式图书的部分要素。这表现在：（1）有被传播的知识信息；（2）有用来记录知识的信息符号；（3）有记载文字、图像信号的物质载体；（4）甲骨文的“书写”有基本的生产技术和工艺。所以，我们可以将其看成是我国古代的一种原始图书典籍。在对甲骨的整治、书写、收藏和验证过程中，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编辑要素，可以将其看成是正式图书出现之前的文书档案编辑工作，所以我们称之为原始的编辑活动。

商周时期，与甲骨文同时的文字还有青铜器铭文和玉石刻辞等，相对应的载体形式则是青铜器、玉器和石头等。

与甲骨文相比，青铜器铭文的篇幅大为增加，记事内容更为丰富，用途也更为广泛，部分铭文已是有意识地要人阅读，因而传播范围更为广泛。所以说，青铜器铭文所起的书籍作用更加明显。



甲骨文拓片